

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对比研究*

刘风光¹ 邓耀臣² 肇迎如¹

(1.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44; 2. 大连海事大学外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6)

摘要: 本研究以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真实语料为基础, 以文化语用学理论为框架, 在综合分析政治道歉的定义、特征、适切条件的基础上, 从政治道歉的言外之力明示手段和政治道歉策略的选用两方面探讨了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的异同。研究表明, 中国政治道歉话语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可分为“道歉/歉意”类、“深感不安/内疚”类和“对不起”类三个类别, 而美国政治道歉则主要采用“apologize/apology”类、“regret”类、“sorry”类及其他四类言外之力指示手段。针对道歉策略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美两种不同的政治道歉倾向, 即中国政治家倾向于构建敢于认错、勇于担责、主动弥补过错的形象, 而美国政治家尽管也能承认错误且表现出主动弥补过错的意愿, 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善于对自己的过错进行辩解和无为承诺, 但缺乏担当责任的特征。本文进一步从中美文化中政治道歉的内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和语境文化三方面对以上差异进行了社会文化动因分析, 揭示产生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并简要讨论了本研究结果对于增强政治互信, 改善国际关系的意义。

关键词: 政治道歉; 言语行为; 言外之力指示手段; 道歉策略

DOI:10.13458/j.cnki.flatt.004309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6)06-0042-14

1. 引言

道歉话语是日常交际中常见的言语行为。《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江蓝生等, 2012: 269)将道歉界定为“表示歉意, 特指认错”。道歉是道歉人承认自己不当或有危害的言行, 承认其言行使人委屈或对人无礼, 同时表示愧疚。Olshtain (1989)将道歉定义为一种言语行为, 意在为实际或潜在因被冒犯而遭受不良影响的听话人提供支持(a speech act which is intend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hearer who was actually or potentially malaffected by a violation)。Tavuchis(1991: 17)认为道歉语是在“一个人对某一行为没有借口、无辩护或解释理由”时产生的承认话语。Lazare(2004)将道歉语定义为两方之中的冒犯方承认其带来的冒犯和招致的不满并愿为之负责, 并对被冒犯方表达后悔或悔恨。

道歉是一个普适概念, 属于Searle(1979: 15)所界定的表达类言语行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 学界对道歉言语行为的分析主要局限于日常话语。除极少数研究以大规模真实语料为基础对英语道歉的语言形式、道歉的策略、道歉的功能以及道歉的语用框架进行系统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学语篇认知语用文体研究”(项目编号: 15BYY182)和辽宁省高等学校“东北亚地区比较文化研究”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 WT2013009)的研究成果, 辽宁省“东北亚外交外事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 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 3132016092)。

作者简介: 刘风光,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英语语用学, 文体学, 语篇分析研究; 邓耀臣, 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料库语言学, 计量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肇迎如, 硕士生, 研究方向: 英语语用学, 语篇分析研究。第一作者邮箱: emilylf@ sina. com



描写外(Aijmer, 1996);多数语言学研究以Leech(1983)的礼貌原则及Brown和Levinson(1987)的面子理论和礼貌理论为框架,采用语篇补全测试、基于假定情境下的调查问卷、回顾性自我报告、角色扮演等研究方法获取模拟数据,对个体在非正式情境中人际道歉语进行研究(Harris et al., 2006),归纳总结了英语常用道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影响道歉策略选择的语境因素、文化因素(Meier, 1998)及社会语用背景。(Olshtain, 1989)

相比之下,政治道歉话语作为公共话语的主要类别(Bentley, 2015)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针对政治道歉语的语言学研究有待深入。目前,相关研究多以英语为母语的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为研究对象(Smith, 2008),少数研究探讨了日本与德国的政治道歉规律,而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鲜有涉猎。虽然道歉是各个文化共有的语言现象且言语行为的实施遵循普遍适用的语用原则(Austin, 1962/1980; Searle, 1969, 1975),但是由于不同语言在言语化与概念化方面存在诸多差异(Green, 1975; Wierzbicka, 1985),要深入了解政治道歉这一言语行为的深层机制还需要我们着眼于世界范围内更多国家的政治道歉实例,从不同社会文化视角理解、分析政治道歉语的内涵。(Cunningham, 2014)

本研究通过对比中美真实政治道歉语料,旨在探讨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的异同,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影响政治道歉策略选择的语境因素进行深层次剖析,以期增强政治互信,改善国际关系。

2. 政治道歉相关研究综述

2.1 政治道歉的定义及特征

所谓政治道歉是指由官员代表政府、组织或者团体向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后裔所做的官方道歉(Thompson, 2005: 4),是政府对于因施政不当而给本国民众或他国人民造成不利或者伤害,表示忏悔并承担责任的公开声明(Hook, 2008: 3)。政治道歉主要是由作为政治道歉人的政治家或者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的其他公众人物在特定文化作用下实施的政治化言语行为。作为公共道歉的重要形式之一,政治道歉兴起于20世纪末,20世纪90年代以前,政治道歉鲜少出现。此后,随着中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政治道歉现象开始走入大众视野,政治道歉研究也日渐丰富(汝绪华,汪怀君, 2013)。近年来因人权受到践踏而请求补偿的运动在世界各地不断高涨。随着部分国家因历史性错误行为相继向受害国公开道歉,政治道歉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分别从政治学与行政学(Kellerman, 2006)、伦理学(Thompson, 2005)、心理学(Nobles, 2008)、社会学(Tavuchis, 1991, Lazare, 2004)、法律与人权以及争端解决和国际关系(Cunningham, 2014)等视角探讨政治道歉的规范和标准。语言学家们也将政治道歉话语看作是一种特殊体裁,对其定义、适切条件、语言学特征以及道歉策略进行了尝试性研究。(Barkan, 2000; Chapman & Thomas, 2006)

就类别而言,根据道歉对象的数量政治道歉分为“多对多”和“多对一”两种类型。官员代表政府向另一个群体所做的道歉是典型的“多对多”型政治道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道歉行为是由具体的个人完成,但他充当的是一个巨大群体的发言人的角色。如果政府

向具体的个人进行道歉,则是“多对一”型政治道歉。这种类型的典型案例是2007年加拿大市民 Maher Arar 遭到加拿大情报局的无辜绑架和折磨,为此加拿大总理 Stephen Harper 代表政府向其道歉。在形式上,政治道歉又分为国内政治道歉和国际政治道歉(Mihai & Thaler 2014: 2)。在本质上,政治道歉是一种政治修复工具,其重要性与彰显的权力正在日益上升(Luke, 1997),在为国家争取政治优势、维护道德原则、国家利益以及修复国际关系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政治全球化的发展,政治道歉语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语篇,逐渐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作为表达类言语行为的重要形式,政治道歉言语行为属于补救性话语,是政治家通过具有道歉功能的言语形式,充满诚意地表达见解,以达到致歉的目的,对听话人产生不同的效果和影响。本研究将政治道歉视为一种由微观话语构成的宏观表达类言语行为。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英语政治道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其语言学和语用学特征。Harris 等(2006)基于英国政治道歉事件,特别是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道歉语料总结了政治道歉语篇的四大显著特征。第一,政治道歉语活跃在大众视野,是高度公共化、受媒体广泛传播的语言。第二,公众道歉语通常产生于矛盾与争议,在大众及被冒犯方的要求下,涉事政要对其冒犯行为进行公开道歉。第三,能够令媒体和受众接受的有效政治道歉语,需要具有明确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 简称 IFID),和用以说明道歉者承认其应付的责任的言语表达形式,二者是政治道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政治道歉语很少会得到免除罪责的回复。Saito(2015)从文化语用学的角度探讨了政治道歉的特征,将政治道歉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社会行为的六个构成要素即:集体呈现、施事者、受众、象征性产出方式、事件发生的背景和环境以及权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进行政治道歉研究的文化语用学理论框架。

2.2 政治道歉的适切条件及策略

政治道歉语的理解过程,不仅涉及道歉方和接受方,甚至还包括置身政治道歉之外的第三方公众。因此,虽然政治道歉语通常来自公众对官方道歉语的需求,但政治道歉语如果表达不当或不符合被冒犯国在特定社会文化下对道歉语的认知,往往会引起很多讨论、争议和冲突(Agyekum 2015; Murphy 2015)。因此,有效的政治道歉语必须满足相应的适切条件。Austin(1962/1980)首次提出适切条件的概念并区分了根本条件、诚意条件和准备条件。Searle(1969)发展了 Austin 的对适切条件的分类,增加了命题内容条件,并指出适切条件是构成性规则,共同组成了言外之力。政治道歉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条件是说话人为政府、组织或团体的过错向听话人(受歉者)表达歉意;准备条件是道歉人或道歉方具有道歉立场,至少一方认为道歉事件确实发生了,至少一方相信该行为是不恰当的(Gill, 2000),确实对当前结果直接或间接负有责任,道歉策略与语言形式的描述与客观世界事实相符;真诚条件是道歉人怀有悔恨愧疚的道歉态度,道歉态度真诚;根本条件是说话人有意使自己的话语被看作是一个道歉,并且说话人的道歉意图被听话人识别。针对道歉适切条件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私人道歉领域。(Ancarno 2015)

道歉策略是理解道歉言语行为的重要切入点,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仅限于日常交际

中的个人道歉,尚未涉及政治道歉。Fraser(1981:263)最早关注道歉策略的分类并提出了包含9种道歉策略的分类框架,在此基础上Olshtain和Cohen(1983)则将这些策略归纳为5种基本范畴和一系列次范畴。他们指出,就道歉言语行为而言,最直接的实现方式是使用明确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即表示遗憾含义的惯例化、程式化语言表达方式,如*be sorry*、*apologize*、*regret*、*excuse*等。这些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的主要功能在于表明说话者对于自己的冒犯行为感到遗憾,旨在抚慰听话者。第二种道歉策略是道歉者承担责任的言语表达,如*It is my fault*。这两种策略是最基本的策略,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在所有语言和所有情境中均可实现。另外三种策略属于具体情境策略,分别是提供解释策略,如因迟到而做出*The traffic was terrible*的解释;提供弥补办法策略,如*I'll pay for the damage I've done*;和承诺克制策略,如*It won't happen again*。这三种策略的使用皆受具体语境的制约。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通常被看作是影响政治道歉策略选择的政治语境因素。(Cunningham, 2014)

Olshtain和Cohen(1983)构建的道歉策略分类框架不仅具有坚实的语用学理论基础,而且具有分类清晰、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因此为随后的道歉言语行为的语用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Blum-Kulka & Olshtain, 1984; Suszczyńska, 1999; 傅蓓, 2010),为揭示日常交际中个人道歉策略的选用机制奠定基础。然而这些策略能否客观反映政治道歉的言语行为规律以及中美政治道歉策略使用规律有何差异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 1) 中美常用政治道歉话语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各有哪些?
- 2) 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的策略有何异同?
- 3) 造成上述政治道歉策略异同的原因是什么?

3.2 数据来源及分析步骤

本研究以真实政治道歉语料为基础探讨以上问题。该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于以往道歉言语行为研究通常采用的言谈情景角色扮演法(spontaneous open role play)和言谈情景填充问卷方法(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 简称DCTs)。其明显优势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以交际过程中自然发生的真实语料作为语言证据,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语言事实的可靠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二是语言证据的采集以语篇为单位而不是单个的句子,这一做法不仅为了解道歉言语行为提供丰富的语境信息,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考察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双向互动,而非仅限于单向言语行为。

英、汉语料分别取自美国和中国官方网站有关政治道歉的报道。相对于日常交际中的个人道歉言语行为,政治道歉语料相对匮乏,所以语料收集过程中我们对语料的时限设定较为宽泛,全部语料为1950年至2015年之间发生的政治道歉事件,汉语语料以近20年的政治道歉事件为主。依据此标准我们共收集到美国政治道歉文本27篇,相应汉语文本25篇,每个文本对应一个政治道歉事件。英语语料中较为典型的道歉事件包括1983年美国因入侵英联邦成员国,里根总统向撒切尔夫人道歉,1999年美国因误炸中国大使馆向中国

道歉 2001 年美国因南海撞机事件向中国道歉 2015 年美国因误袭阿富汗无国界医院而道歉。汉语语料包括河北保定、广东中山、河南焦作、河南南阳等地市长因环境问题向民众道歉 2015 年因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市委书记道歉 2015 年因天津港爆炸市长道歉等。同样受语料可获得性的限制,本研究没有区分国内道歉和国际道歉。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取了人工阅读文本,手动提取政治道歉言语行为证据的方法。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语言证据的收集过程中,本研究只考虑了直接引语中的道歉话语。共收集英语道歉话语片段 58 个,汉语道歉语片段 52 个。对于政治道歉话语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和政治道歉策略除了统计原始频数,本研究还分别计算了各自的百分比。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中美常用政治道歉言外之力指示手段

言外之力是施事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即语力(Austin, 1962/1980)。Searle(1979)指出句子所具有的言外之力取决于句子中所采取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使用明确的施事动词、词序、重读、语调、语气以及标点符号等。道歉类言语行为作为一种表达类言语行为,通常具有表达歉意、认错等道歉语力。政治道歉具有高度公开化的特征,因此,道歉方唯有使用明确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才能更容易为媒体和受众所接受。

为了清楚了解中美常用政治道歉言外之力指示手段,本研究基于所提取的中美语料中的道歉话语,根据表示道歉意义的关键词对言外之力指示手段进行手动分类并统计每一类在所研究语料中出现的频数和所占比例,结果见表 1 和表 2。

表 1 美国政治道歉语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类别及分布

类别	言外之力指示手段	频数	百分比
apologize/apology 类	I (sincerely /deeply) apologize for. . .	11	38.10%
	The time has come to apologize for. . .	2	
	I/We (want to) express/extend the apology for. . .	2	
	Please accept our sincere apology for. . .	1	
	小计	16	
regret 类	I/We deeply /sincerely regret that. . .	6	28.50%
	I/We want to express regret. . .	3	
	It was a very regrettable. . .	2	
	Regrettably, . . .	1	
	小计	12	
sorry 类	I am (so) sorry. . .	7	26.19%
	The people of. . . are sorry. . .	4	
	小计	11	
其他类	I beg your forgiveness 等	3	7.14%
	总计	42	100%

由表 1 数据可知,本研究所基于的 27 篇美国政治道歉文本中共有 42 处使用了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大致可划分为“apologize/apology”类、“regret”类、“sorry”类和其他类别。就分



布而言,用于直接实施道歉言语行为的“apologize/apology”类的使用频率最高,共出现16次,占全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使用频数的38.10%。其中I(sincerely/deeply)apologize for...是实现这一功能的首选表达方式。如:

1) I sincerely apologize my friends for those of you took offense and were offended.

2)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South Carolina ,I apologize for decades of suffering and pain. . .

3) I apologize to Native Hawaiian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 .

另外 ,I/We (want to) express/extend the apology for. . . 也是表达主动道歉之意的重要手段。如:

4) I want to express to the family involved as well as to the people of Okinawa my sincerest apology and most profound regret . . .

5) I extend this formal apology to Indian people. . .

“regret”类和“sorry”类都是通过表达“遗憾”之意间接完成道歉行为,二者功能相似,使用频率接近,分别占全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的28.50%和26.19%,都明显低于“apologize/apology”类的使用频率。值得注意的是,“regret”类不仅使用频率稍高于“sorry”类,而且其表达方式较后者更灵活、多样。道歉者除了将regret用作动词构成I/We deeply/sincerely regret that. . .这一典型结构外,还灵活地使用其名词和形容词形式分别构成I/We want to express regret . . .和It was a very regrettable . . .结构。如:

6) We deeply regret the tragic loss of life that occurred. The Defense Department will conduct a full investigation.

7) I want to express to the family involved. . . my sincerest apology and most profound regret for the incident and for the anxiety it has created.

8) It was a sad and regrettable chapter . . . one that must never be repeated.

9) Regrettably ,in the course of the U. S. response to the Iranian attack ,an Iranian civilian airliner was shot down by the VINCENNES.

相比之下,“sorry”类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结构形式较为单一。虽然根据所表达歉意程度的不同,sorry前面的强势语具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可分别使用so、truly、very以及terribly等副词,但是受政治道歉语境的影响道歉者通常仅使用I am/The people of . . . are . . . sorry for . . .结构,如以下例句所示。

10) To our African American citizens ,I am sorry that your federal government orchestrated a study so clearly racist.

11)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orry — for the loss ,for the years of hurt.

12) The people of California are deeply sorry for the suffering you endured.

和日常交际中个人道歉言语行为相比较进一步凸显了政治道歉中常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及其特征。首先,就使用频率分布而言,无论是基于大规模英语口语语料库的分析结果(Aijmer,1996)还是通过言谈情景填充问卷获得的数据(Suszczynska,1999)均显示,“sorry”

类是个人道歉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道歉言外之力指示手段,而“apologize/apology”类的使用频率最低,但由表1中数据可知,二者在政治道歉语境下使用频率分布型式正好相反。这是因为相对于“sorry”类具有“通用”和“无标记的惯例化”特性的道歉表达方式,仅限于正式场合下使用的“apologize/apology”类道歉指示手段更适合政治道歉语境的需求(Aijmer, 1996: 84)。另外,本研究所统计的数据中没有出现 sorry、excuse me 和 pardon 三种高度口语化非正式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这一现象同样与政治道歉的正式性和道歉者所要体现的诚意有关。Aijmer 认为, pardon 仅适用于道歉者没有听懂别人所说话内容的场合, excuse me 和 sorry 则频繁使用于因违背社会礼节的微小冒犯而进行的道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悔恨愧疚之意(Aijmer, 1996: 84), 仅仅是礼节性的道歉(a ritual apology)(Fraser, 1981: 266)。况且口语化程度较高的 sorry 大量应用于电话交谈,几乎不用于公开场合(Aijmer, 1996: 90)。由此可见,这三种道歉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由于无法满足政治道歉的适切条件,而被政治道歉者所回避。

表2 中国政治道歉中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类别及分布

类别	言外之力指示手段	频数	百分比
“道歉/歉意”类	向……(诚恳)道歉/致歉	10	47.22%
	表示道歉	2	
	表示(深深的)歉意	5	
	小计	17	
“深感不安/内疚”类	深感愧疚/内疚	7	41.66%
	深感不安和自责	2	
	深感痛心/难过/难受	5	
	不好意思	1	
	小计	15	
“对不起”类	我作为……对不起……	4	11.11%
	小计	4	
合计		36	100%

表2数据显示,本研究的25篇中国政治道歉文本中共有36处使用了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大致可划分为“道歉/歉意”类、“深感不安/内疚”类和“对不起”类三个类别。由每个类别所占比例可知,和英语中的分布型式一样,用于直接实施道歉言语行为的“道歉/歉意”类的使用频率最高,表达歉意程度最强,共出现17次,占全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使用频数的47.22%,该类表达方式的正式程度最高,其中最为典型的表达方式是“向……(诚恳)道歉/致歉”,其使用频率远高于“表示歉意”和“表示道歉”两种表达方式。如:

13)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失踪者的亲属和全体的受灾群众,向全社会诚恳道歉!

14) 作为市环境保护局局长,没有尽到应尽职责,深感愧疚,对不起市委、市政府厚望和市民期待,特向广大市民诚恳道歉。

15) 为此深感内疚和痛心,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表示深深的歉意!

此外,“深感不安/内疚”类言外之力指示手段使用频率为41.66%,仅次于“道歉/歉意”

类,成为中国政治道歉言语行为中第二大言外之力指示手段。该类别主要由表达遗憾悔恨之意的“内疚”、“惭愧”、“不好意思”;表达痛苦之意的“心痛”、“沉痛”以及部分表达自责含义的词语或短语组成。如:

16)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对这次事故的不幸发生都深感痛心。我作为省长,作为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深感内疚和自责,对不起全省人民和死伤的群众。

17) 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情我们很不好意思。

18) 两次事故对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感到十分沉痛,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向国务院和培炎副总理做深刻的检讨。

中国政治道歉中使用频率最低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是“对不起”类表达方式,仅占11.11%。尽管本研究将它作为一类,实际上实现方式主要是“对不起”。该表达方式通常和“作为……”连用,通过表明自己的身份,凸显应承担的责任,达到更清楚表达道歉诚意的目的,如例句14)、16)和例句19):

19) 作为罗平县领导,我感到非常的难过。我对不起遇难者及其家人,更对不起事故中受到伤害和不幸遇难的4名儿童。

和汉语个人道歉语研究结果相比较也同样揭示了政治道歉语境对惯例化表达方式选择的制约作用。首先,在众多道歉言外之力指示手段中“道歉/歉意”类表达方式在个人道歉中使用频率最低(傅蓓,2010:73),正是由于政治道歉的正式性促使了该类表达方式在本研究语料中的高频出现。另外,就具体的道歉表达方式而言,“不好意思”是个人道歉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道歉套语,约占全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出现比例的80%(傅蓓,2010:73),但在政治道歉中使用频率最低,在本研究的语料中仅出现1次。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表达方式,“不好意思”趋于口语化,且表达歉意的方式相对委婉。从字面意思来看,该套语表示自己做的事让自己没面子,具有贬损自己的含义(傅蓓,2010:74),带有自谦的成分。道歉者使用该套语的主要动机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谦卑,获得被道歉者的认可,达到道歉的目的。这种方式委婉、悔意程度较低,道歉方式显然不适合损害对方程度较重或需要表达强烈悔意的政治道歉场合。

4.2 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策略对比

道歉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言外之力标志、承担责任或接受指责的言语表达、辩解和说明、提供修复方案以及保证未来不犯此类错误(Harris et al., 2006)。学界对于道歉策略做过诸多讨论(Blum-Kulka & Olshtain, 1984; Fraser, 1981; Olshtain & Cohen, 1983; Owen, 1983),本研究采用Olshtain和Cohen(1983)提出的道歉策略分类框架对比分析中美政治道歉策略的差异,结果见表3。

Fraser(1981)将道歉策略分为直接道歉策略和间接道歉策略,分别对应于两类不同的道歉言语行为。Searle(1979)指出间接言语现象实质上是通过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实施某一种言语行为。换言之,说话人想要通过句子的“字面意义”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在政治道歉中,言外之力明示话语属于直接道歉言语行为,其余四种策略则具有间接

性,但是各个策略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有机结合,共同实施由各微观话语如断言、指令、承诺以及宣告共同构成宏观政治道歉言语行为。

表3 中美政治道歉策略分布对比

道歉策略	美国		中国	
	频数	%	频数	%
言外之力指示手段	42	56.00%	36	52.17%
承担责任表达	14	18.67%	25	36.23%
承诺克制	9	12.00%	2	2.90%
提供弥补	6	8.00%	4	5.80%
解释辩解	4	5.33%	2	2.90%
合计	75	100%	69	100%

由表3统计结果可清楚看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政治道歉中直接道歉策略,即运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直接表达歉意策略都占有绝对优势,均占全部策略使用量的一半以上,成为中美政治家实施政治道歉的首选策略。而承担责任表达策略是两国政治道歉中使用最为频繁的间接道歉策略,尽管该策略在两国政治道歉话语中所占比例差异悬殊,在中国政治话语中该策略占36.23%,而在美国政治道歉话语中仅占18.67%。例20) —24) 是该策略在中美政治道歉中的典型实例。

20) 作为市委书记又是市长,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天津,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天津人民带来了损失,也在全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我要承担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21) 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首先需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22) That does not mean no one is responsible and we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tragic accident.

23) Going back to the time before we were even a nation, European-Americans received the fruits of the slave trade and we were wrong in that.

24) It is time for reflection and contemplation, a time for sorrowful truths to be spoken.

另外,表3数据同样表明两国政治道歉话语策略的选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首先,尽管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策略和承担责任表达策略都是两国政治家的最常用策略,但这两种策略在两国政治道歉话语中所占比例差异明显。这两种策略占美国政治道歉策略的74.67%,而在中国政治道歉话语中二者比例之和高达88.4%。这一结果表明,相对于美国政治家,中国官方人员更善于采用显性表达方式承认错误、表达歉意并积极承担责任。另外,美国政治道歉中承诺克制策略的比例仅次于承担责任表达策略,远高于提供弥补策略和解释辩解策略。与此相反,该策略很少被中国政治家所采用,在本研究所考察的中国政治道歉话语中只出现2次,仅占全部道歉策略的2.9%,比例最低,如例25) —27) 所示。

25) Never again will this agency stand silent when hate and violence are committed against Indians. Never again will we allow policy to proceed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Indians possess less human genius than the other races.



26) That can never be allowed to happen again. We can begin by making sure there is never again another episode like this one.

27) ……并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本年度内一定摘掉“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

为了更清楚了解中美政治道歉策略的选择是否存在分布上的差异,我们对表3显示的数据进行了卡方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表明,在1%置信水平上中美五种道歉策略的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chi^2 = 17.56$, $df = 4$, $p = 0.002 < 0.01$)。这一结果说明中美政治家在实施政治道歉言语行为时采用了不同的政治道歉策略。为了进一步揭示差异所在,我们对表3数据进一步进行卡方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在5%置信水平上,中美政治家对承担责任表达和承诺克制两种策略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政治家明显更多地采用承担责任表达的策略,是美国政治家使用量的2倍,二者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chi^2 = 4.76$, $p = 0.03$)。而美国政治家则明显依赖于承诺克制策略,即道歉方通过承诺类言语行为,保证未来不会再发生类似冒犯行为,进而间接实施道歉言语行为。该策略占美国政治道歉全部策略的12%,是中国政治道歉话语中使用量的4倍,二者差异的显著性也具有统计学意义($\chi^2 = 4.22$, $p = 0.04$)。

进一步对比分析真实道歉语料我们发现,以上两类政治道歉策略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使用数量上,在具体实现方式上也有所不同。美国政治道歉言语行为在采取承担责任策略时,通常通过使用被动语态降低道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歉者对于承担责任的消极态度。如例28)、29)和30)所示。

28) These wrongs must be acknowledged if the healing is to begin.

29) Substantial wrong has thus been done which a due regard for our national character as well as the rights of the injured people requires we should endeavor to repair.

30) Yet in these more enlightened times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the deliberate spread of disease, the decimation of the mighty bison herds...

以上对比分析从定性、定量两方面揭示了中美政治道歉策略使用型式的差异,即在实施政治道歉言语行为时,尽管中美政治家都大量依靠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策略直接表达歉意,但相对于美国政治家,中国政治道歉者更多地采用承担责任表达策略和提供弥补策略而较少采用承诺克制策略。美国政治家则善于采用承诺克制策略和解释辩解策略而明显少用承担责任策略。由此反映了中美两种不同的政治道歉倾向,即中国政治家倾向于构建敢于认错、勇于担责、主动弥补过错的形象,而美国政治家尽管也能承认错误且表现出主动弥补过错的意愿,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善于对自己的过错进行辩解和无为承诺,但缺乏担当责任的特征。

4.3 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差异的社会文化动因分析

本文采用文化语用学的理论框架,从中美文化中政治道歉的内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和语境文化三个方面对以上所揭示的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差异进行较为深入社会文化动因分析。

1) 中美文化中政治道歉内涵差异

道歉是说话人之间重建社会和谐的补救手段之一(Goffman, 1971: 33)。尽管道歉话语在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但其使用和功能存在文化差异(Wolfson et al., 1989: 174)。根据上述分析,政治道歉话语也不例外,其差异性源自中美两国对道歉内涵的不同理解。

中华文化尚礼重德,在传统儒道文化中,“礼”具有十分丰富的意义。“礼”是指一种为人处世,仁爱忠信的情感态度和内在表现。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儒家文化倡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老子亦强调“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此外,“礼”又是维系社会伦理秩序的制度规范,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是仪式的内在核心。董仲舒曾定义“礼”:“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因此,中国人格外看重礼仪,故当不符合礼仪规范的冒犯行为发生时,冒犯方常以严肃正式的形式向被道歉方致歉。如秦王嬴政向唐雎道歉,“长跪而谢之”,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臀部靠在脚跟上,直身而跪。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之下,中国文化注重政治道歉表达的明示词语及其他明示手段,如语气词“啊”(很惭愧啊)以及道歉的副文本特征。例如中国要求澳大利亚议员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官方书面道歉时,曾要求其两封道歉信均以议员办公室信笺撰写,抬头为“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马朝旭”,信的最开头用黑体字标明。可见中国对政治道歉的副文本特征要求较高。

中美政治道歉采取言外之力明示策略频次相似,但两种文化对于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的内涵理解不同。美国受法律文化影响,将道歉看作是对侵害事实的承认(郝维华, 2011: 71)。在美国 apologize/apology 类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多用在因主观犯错导致的直接冒犯行为并需负法律责任的道歉表达法。regret 和 sorry 类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用于非蓄意冒犯行为中,表达歉意与遗憾。但在中国政治道歉中最能够体现道歉诚意与悔过态度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是“道歉”,并且中国人认为能与“道歉”相对的词语只有“apologize”。

2) 个体、集体面子与中美政治道歉

在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文化维度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集体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在对待群体内和群体外成员方面有差异。与个体主义相比,集体主义文化更注重群体内成员之间的社会和谐(Triandis, 1995: 34)。道歉作为一种礼貌策略和面子威胁行为,与社会距离、社会优势、社会权力及不同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所强加的绝对级别相关。道歉言语行为的目的是“恢复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均衡或至少减少二者之间的不均衡”(Leech, 1983: 125)。可见,面子对政治道歉的产生和理解有重要影响。政治道歉话语是威胁道歉人消极面子,维护受道歉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面子呈现在个体、关系以及集体层面中,具体表现为个体面子、他人面子以及集体面子。(Spencer-Oatey, 2007: 639)

陈新仁(2013: 27)指出特定场景环境下交际者从若干身份中选择甚至新建某个特定的身份进行交际是一个语用过程,通过特定的话语方式加以建构具有目的性和动态性。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做出不同的身份选择和建构会对交际产生不同的影响。Augustinos 等(2011)认为情感因素和身份类别对成功实施政治道歉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政治道歉中,官方道歉人从若干社会身份中选出作为政府机构责任人的身份,主动积极承担责任。以在

一定程度上以威胁个人消极面子的方式保全集体消极面子,多以“第一责任人”等表述建构了其政府机构责任人的身份,目的在于主动承担事故责任。而美国政治道歉个体倾向于以集体口吻做出道歉,如克林顿总统向塔斯基吉医学研究受害者道歉“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orry for the loss for the years of hurt”。克林顿总统以“The American people”构建了自己作为美国人民一员的身份,因为他们视政治道歉为集体行为,为保全个人面子,在实施中通常撇清个人责任,同时以集体一员的身份唤起其他集体成员的同情与认同。研究发现,政治道歉过程中,个体-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面子”成为影响政治道歉身份构建的重要因素之一。道歉人如果能够灵活变换身份层次,即个人身份、中层身份和高层身份则能有效实现致歉意图,唤起同情及认同感,得到公众理解甚至宽恕。

3) 高、低语境与中美政治道歉

语言文化让人对外部世界的信息产生一种选择,由于这种选择,人们可对交际语言信息进行筛选。在文化交流中,交际双方所传递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交际语言本身或来自交流的场合,即语境。根据这种信息来源方式的不同,Hall(1976:105)把多样性的文化划分为两类,即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是指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信息的创造主要依赖于交际语境而非依赖于交际语言本身,像中国文化、日本文化、非洲文化、拉丁文化都属于高语境文化。而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指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信息的创造不是依赖于交际语境,而主要依赖于交际所使用的语言。像美国文化、加拿大文化以及多数欧洲文化都属于低语境文化。Hall(1998:53)指出,在高语境国家交际者基于对关系、语境、对话的非言语线索理解信息。然而,在低语境国家,交际信息则需要清楚明示。Ting-Toomey(1988:225)扩展了Hall的文化语境维度,认为低语境文化是直接言语交际和个体非言语风格,高语境文化是间接言语交际和语境非言语风格。因此,政治道歉的文化属性差异来自高、低语境交流模式。

根据高低语境文化交际特点可知,低语境文化中的政治道歉更多地依赖明示信息。因此,美国政治道歉倾向于采取解释辩解策略,通过对冒犯行为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通过道歉话语本身明示其道歉立场或澄清其冒犯原由,进而达到致歉目的。相反,在高语境国家,政治道歉所传递的语言信息、道歉信息的功能或致歉意图可通过语境因素实现。中国是高语境文化国家,人们进行交流或行动的意义主要依靠交际语境。因此,中国政治道歉极少采取解释辩解策略,对于政治道歉所蕴含的言外之力更多地通过道歉事件背景及道歉方所处的政治语境进行传达。

5. 结语

通过对中美政治道歉真实语料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中国政治道歉话语言外之力明示手段主要包括“道歉/歉意”类、“深感不安/内疚”类和“对不起”类三个类别,而美国主要采取“apologize/apology”类、“regret”类、“sorry”类及其他四类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在实施政治道歉言语行为时,中美政治家都大量依靠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直接表达歉意。基于两国文化对道歉内涵的不同理解,美国在个人主义及低语境文化影响下,强调个体角色,根据个人

的决定采取行动。因此,美国政治家视威胁个人消极面子的政治道歉为集体行为,在政治道歉中采用承诺克制策略及解释辩解策略,更多地构建集体责任身份,解释冒犯原因,保证未来克制。而注重道歉形式、维护集体面子的高语境中国文化,强调社会责任和义务,期待个体从维护社会凝聚力角度出发,采取行动。因此,中国官员更多地采用承担责任表达策略和提供弥补策略而较少采用承诺克制及解释辩解策略实施政治道歉。由此反映了中美两种不同的政治道歉倾向,即中国政治家倾向于构建勇于担当、主动弥补过错的形象,而美国政治家尽管也表现出主动弥补过错的意愿,但更善于承诺但也缺乏担当责任。充分理解中美政治道歉的差异及其文化动因有助于增进两国互信,促进政治、文化交流,改善国际关系,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 [1] Agyekum, K. 2015. The pragmatics of political apology in Ghana's contemporary politics [J]. *Lego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26): 58 - 79.
- [2] Aijmer, K. 1996.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in English: Convention and creativity [J]. *Language in Society*, (3): 387 - 389.
- [3] Ancarno, C. 2015. When are public apologies "successful"? Focus on British and French apology press up-tak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84): 139 - 153.
- [4] Augoustinos, M., B. Hastie & M. Wright. 2011. Apologizing for historical injustice: Emotion, truth and identit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5): 507 - 531.
- [5] Austin, J. 1962/1980.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Barkan, E. 2000. *The Guilt of Nations: Restitution and Negotiating Historical Injustices* [M]. New York: Norton.
- [7] Bentley, J. 2015. Shifting identification: A theory of apologies and pseudo-apologies [J]. *Republic Relations Review* (1): 22 - 29.
- [8] Blum-Kulka, S. & E. Olshtain. 1984. Requests and apologies: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realization patterns [J]. *Applied Linguistics* (3): 196 - 213.
- [9] Brown, P. & S. Levinson.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Chapman, G. & J. Thomas. 2006. *The Five Languages of Apology* [M]. Chicago: Northfield Publishing.
- [11] Cunningham, M. 2014. *States of Apology*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2] Fraser, B. 1981. *On apologizing* [A]. In F. Coulmas (ed.). *Conversational Routine: Explorations in Standardized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and Prepatterned Speech* [C].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 [13] Gill, K. 2000. The moral functions of an apology [J].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1): 11 - 17.
- [14] Goffman, E. 1971.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M]. New York: Harper & Row.
- [15] Green, G. 1975. How to get people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A]. In P. Cole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6] Hall, E. 1976. *Beyond Culture* [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17] Hall, E. 1998. The power of hidden culture [A]. In M. Bennett (ed.). *Basic Concep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lected Readings* [C]. Yarmouth: Intercultural Press.
- [18] Harris, S., Grainger, K. & Mullany, L. 2006. The pragmatics of political apologies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6): 715 - 737.
- [19] Hook, G. 2008. The political apology as a millennial phenomenon [J]. *MAI Review* (2): 1 - 13.
- [20] Kellerman, B. 2006. When should a leader apologize and when not?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 72 - 81.



- [21] Lazare A. 2004. *On Apolog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2]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 [23] Luke A. 1997. The material effects of the world: Stolen children and public discourse [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3): 343 – 368.
- [24] Meier A. 1998. Apologies: what do we kno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 215 – 231.
- [25] Mihai M. & M. Thaler. 2014.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Political Apologies* [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26] Murphy J. 2015. Revisiting the apology as a speech act: The case of parliamentary apologies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 175 – 204.
- [27] Nobles M. 2008. *The Politics of Official Apologi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8] Olshtain E. 1989. Apology across cultures [A]. In S. Blum-Kulka J. House & G. Kasper (eds.)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s and Apologies* [C]. New York: Ablex.
- [29] Olshtain E. & A. Cohen. 1983. Apology: A speech act set [A]. In N. Wolfson & E. Judd (eds.) .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Rowley: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 [30] Owen M. 1983. *Apologies and Remedial Exchanges: A Study of Language Use in Social Interaction* [M]. New York: Mouton.
- [31] Saito H. 2015. The cultural pragmatics of political apology [J]. *Cultural Sociology* (6): 1 – 18.
- [32] Searle J.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3] Searle J. 1975. *Indirect Speech Act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34] Searle J.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5] Smith N. 2008. *I Was Wrong: The Meanings of Apologi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6] Spencer-Oatey H. 2007.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the analysis of fa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 639 – 656.
- [37] Suszczyńska M. 1999. Apologizing in English, Polish and Hungarian: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strategi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8): 1053 – 1065.
- [38] Tavuchis N. 1991. *Mea Culpa: A Sociology of Apology and Reconcili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39] Thompson J. 2005. Apology justice and respect: A critical defense of political apology [R].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and Applied Ethics 12th Annual Conference. Adelaide.
- [40] Ting-Toomey S. 1988. Intercultural conflict styles: A face-negotiation theory [A]. In Y. Kim & W. Gudykunst (eds.) . *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 Newbury Park: Sage.
- [41] Triandis H. 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M]. Boulder: Westview.
- [42] Wierzbicka A. 1985.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fferent speech act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9): 145 – 178.
- [43] Wolfson N. T. Marmor & S. Jones. 1989. Problems in the comparison of speech acts across cultures [A]. In S. Blum-Kulka J. House & G. Kasper (eds.) .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s and Apologies* [M]. New York: Ablex.
- [44] 陈新仁. 2013. 语用身份: 动态选择与话语建构 [J]. *外语研究* (4): 27 – 32.
- [45] 傅蓓. 2010. 汉语道歉语的话语研究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6): 70 – 77.
- [46] 郝维华. 2011. 加拿大—中国道歉法的比较分析 [J]. *比较法研究* (6): 65 – 72.
- [47] 江蓝生 谭景春 程荣. 2012.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48] 汝绪华 汪怀君. 2013. 国外政府道歉研究述评 [J]. *国外理论动态* (9): 89 – 96.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Space-time Narrative in Cross – border Japanese Modernism Poetry: Based on Fuyue Anzai’s Poetry p. 31. *CHAI Hongmei*

“Gaidi” usually indicates a place located beyond the country bears the meaning of “colony” which is the outcome of the military invasion and colonization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It refers not only to a historical existence but a political geographic space.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poetry by Fuyue Anzai who once lived in a Japanese “colonial” city of China’s Dalian argues that Japanese Modernism Poetry did not originate domestically but from the “Gaidi” of Dalian, China.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metaphors in Fuyue Anzai’s poetry and reveals the nature of invasion and colonization in Japanese Modernism Poetry. The study shows that Political Geography is a good point of view to study cross-border Japanese Modernism Poetry. By investigating Space-time Narrative in Japanese Modernism Poetry from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aspects, it could unfold the forgotten truth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Modernism Poetry.

Key Words: Political Geography; “Gaidi”; cross-border; Japanese Modernism Poetry; Fuyue Anzai; political metaphor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Apology Speech Acts p. 42. *Liu Fengguang, Deng Yaochen & Zhao Yingru*

Based on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data of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apology speech acts an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properties and felicity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apologies,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apology speech acts in terms of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s and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apolo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pragmatic theor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s (IFIDs)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apolog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pologize/apology”, “deep remorse/guilty” and “sorry”. Wherea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apologies are mainly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of IFIDs “apologize/apology”, “regret”, “sorry” and others. Two different inclinations of delivering political apologies appear in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nations’ apology strategies. That is, the Chinese statesmen tend to establish an image of committing misbehaviors bravely,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boldly and making restitutions actively. However, although the American statesmen extend admission of mistakes and willingness to render compensation to a large extent, they are apt to give detailed accounts and explanations for the offense and make inadequate commitment for their faults, lacking the quality of accept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study probes into the socio-cultural causes of the above discrepancies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political apology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nd cultural context, reveals the in-depth causes of political apology diversities and undertakes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rrent study on enhanc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political apologies; speech acts; 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s; apology strategies

Effects of Output Task Type and Word Imageability on EFL Learners’ Vocabulary Acquisition p. 56. *Bao Gui*

This study employed a 2 × 2 mixed factorial design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output task type and word imageability on EFL learners’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e task type effect was found to be moderated to some extent by word imageability. In receptive vocabulary knowledge, a medium task type effect size was found only at the low level of word imageability, and the word imageability effect was found across the tasks but with different effect sizes. In productive

